

“中体西用”与“和魂洋才”之比较

□侯明喜

19世纪中期,面对西方“文明”的严峻挑战,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闭关自守的东方国家,都被迫打开“大门”,分别启动了以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为标志的近代化的历史进程。中国的洋务运动以“中体西用”作为指导思想,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“和魂洋才”作为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总原则。二者貌虽相似,实则有异。

—

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(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)和太平天国的内外打击下,在昏昏然之中终于感受到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厉害,从而掀起了“向西方学习”的洋务运动。但是,中国是否有必要引进洋务?洋务如何适用于中国?以洋务名义所介绍的西方技艺、学理、经验、制度等能否同样在中国行之有效?……这些却在清王朝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论战。这实质上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。而如何实现把西学引进中国这一时代使命,则直接表现为怎样解决中学和西学的关系,使之融合为一个新的文化统一体的问题。于是产生了用“主辅”、“体用”、“本末”这些概念来界定中学、西学关系的议论。“中体西用”文化观,作为一种时代思潮,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早在1842年,魏源就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学习西方应“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”^①,这可看作是“中体西用”文化观的思想渊源。1861年,冯桂芬提出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,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^②以求自治富强,无疑应看作是“中体西用”思想的雏形。

之后,洋务派官僚及其思想家如李鸿章、薛福成、郑观应等都用体用、道器、主辅之说,具体阐释了“中体西用”思想。在洋务运动后期,郭嵩焘提出了“西洋立国有本有末”^③,进一步发展了中体西用思想。1895年4月,上海《万国公报》的编者沈寿康从中西学问关系的角度第一次明确提出:“夫中西学问,本自互有得失,为华之计,宜以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^④。1896年8月孙家鼐就创办新式学堂的宗旨而上奏说: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中学有未备者,以西学补之;中学有失传者,以西学还之。”^⑤在此之后,不仅康、梁维新派人士主张“中体西用”,就连顽固派也大讲中体西用;尤其是张之洞著《劝学篇》倡导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经光绪帝以谕旨形式强行推广,影响甚大。“中体西用”就成为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“流行语”,成为人们探讨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。

作为多元复合型文化的日本,在平安时期(794—1192年)就以“和魂汉才”为原则指导中日关系。幕府末年,西学东渐,汉学衰微,于是取法他师,兰学渐兴。1853年7月和1854年2月,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入东京湾,用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,给日本以巨大的震撼,日本有识之士遂将“和魂汉才”的师法对象转向西方,提出“和魂洋才”。19世纪50年代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即明确提出“东洋道德,西洋艺术”^⑥的口号,也即“和魂洋才”的同义语。“开国”后的桥本左内和横井小楠也曾明确地论及这一问题。明治政府颁布的《五条誓文》亦强调:

文史杂志 24 2000年第2期

“破除旧来陋习,求知识于世界。”一时间,着西洋服,食西洋餐,跳西洋舞风靡东瀛;英国的功利主义、法国的自由民权学说、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德国的军国主义等各种西方政治思潮蜂拥而至,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的欧化主义时期。针对这种重才艺,忽视东洋道德的现象,政府颁布了《教育敕语》以振兴集权主义国家观。敕语说:“吾臣民克忠尽孝,亿兆一心,世济厥美,此乃吾国体之精华。”^⑦要求恢复孔子祭,创办斯文会,掀起儒学复兴运动,以牢牢树立起“日本精神”。这样日本“开国”以后,“和魂洋才”就成为处理日本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,“东洋道德,西洋艺术”也成为流行语。因此,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沿着“和魂洋才”的路线前进的。

二

近代中日两国基于相近的历史背景,相近的民族境遇,在相近的时间里提出了如此相似的口号:“中体西用”与“和魂洋才”,用以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。我们分析其二者的相同点是:

第一,都是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模式。近代中、日两国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,被迫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。在这不自觉的社会转型中,“中体西用”和“和魂洋才”乃是东西方文化冲撞后的融合折衷模式。尽管二者均是尽可能地将外来文化限定在原有文化模式中,但毕竟是第一次冲破了传统夷夏观念的束缚,给西学以一定的地位,从而有利于近代文化的嬗变,也有利于开创近代化的新途。

第二,二者的内涵不断演变。“中体西用”和“和魂洋才”都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。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加深和变革的日渐深入,“西用”的内涵日渐拓展,而“中体”内涵却日渐缩小。在郑观应的最初阐释中,“中体”包括政治秩序和道义观念,如刑政、法制、风俗等;“西用”只包括洋器洋技之长,如火器、轮船等。在1875年郭嵩焘阐明“西洋立国有本有末”之后,西用的范围逐渐扩展,已由船坚炮利逐渐扩展到西方的科学技术、经济模式,甚至推及政治体制。这样,“西用”竟然把“西体”囊括进来了。而“中体”已剥去政教法度,剩下的只有理学家宣扬的世代相袭的“尧舜文武”的法统和“危微精一”的道统。日本的情形与中国也颇相似。不过,在明治二十年(1877年)以后,情形有所改变。明治政府从皇权主义出发,排挤西洋思想,推崇日本民族固有传统

精神——“和魂”。

第三,二者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现代化的延误或中断。“中体西用”的局限性是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就予以批判了的。由于固守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,衰微僵化的清王朝已无力领导中国早期工业化,近代化的启动只能依靠地方督抚大臣,导致洋务运动的层次低、官僚性强、成效不大。同时固守传统教育—文化体制,也妨碍了西学的传播。新式学堂影响甚微,西学书籍少有人问津,西学难以扎根,“西用”的推广困难重重。这样固守中体,因其制度性障碍延误了近代化进程。严复对此也不无遗憾地说:“其(中体西用)害于吾国长进之机,少者十年,多者数纪。”^⑧

人们常把明治维新当作资本主义近代化成功的典范加以推崇,但却忽视了一个要害点,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仅仅是西洋艺术和民族精神的成功,资产阶级是和天皇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式资产阶级。在这种背景下,盛极一时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只有中途夭折的命运。因此,日本的近代化是“跛行的”。这种畸形的近代化使得明治政府大肆推崇“和魂”,大搞“儒学复兴运动”,大力提倡“神道”,并与皇权主义相结合。随着皇权观念的法西斯化,日本儒学的主要功能便成为对外侵略的工具。但最终玩火自焚,军国主义不仅炸毁了东亚早期各国近代化的初步建树,也最终炸毁了日本早期近代化成果。“和魂”的畸形发展使得日本付出了近代化中断的沉重代价。

在探讨了两种文化观的相同点之后,我们更应注意到其不同点。正是这些差异,表明了近代中日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。

首先,主客文化在各自模式中地位有所不同。在“中体西用”模式中,“中体”与“西用”的关系,无论具体阐释如何,无外乎都是以“主辅”、“本末”、“体用”等传统哲学范畴来概括。所谓“中学其本也,西学其末也。主以中学,辅以西学。”哪怕是曾批评中体西用的严复,在1912年就任北大校长时,提出的办学宗旨仍是遵循“中体西用”原则。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更是服膺张之洞的“中体西用”。而在日本的“和魂洋才”模式中,“东洋道德”与“西洋艺术”是并列的,即所谓“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,以西洋艺术诸科学为纬。”^⑨经纬交织,相互钩贯,没有本末、先后、轻重之分。正因为如此,日本在引进西方文化上,表现出比中国更为积极开放的态度。

其次,指导思想的贯彻情况有所不同。在“中体

西用”思想指导下,只局限于引进西方器物层次的文化,这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:六十年代涉及器物层面;七八十年代才推至制度层面;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深入到文化层面。而在不同层面的进展又十分缓慢;即便同一个层面的演变,也十分迟缓。究其原因,是因当时人们在观念形态上,一直未脱离“西学源于中学”或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窠臼。

而日本的情形较之中国却不一样。日本明治政权克服内部的各种纷扰,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从模仿西方的器物层面跃进到制度、思想文化层面。外来文化推进之迅猛,较典型地体现在欧化主义时期作为“文化开化”象征的“鹿鸣馆”、西洋式建筑、西洋礼仪。传统主义在此被抛得一干二净,以致日本人可以这样回答德国人的提问:“我们没有历史,我们的历史从今天开始。”^①即使在明治后期推崇传统,复兴儒教之际,西方的法律、政治体制仍然为畸变的“和魂”披上了“文明”的外衣。

一位亲历这一时期的英国学者霍尔·张伯伦惊诧日本“在一瞬间从武士发髻的时代经历文艺复兴壮举而进入了近代。”他感叹地说道:“他感到自己突然长到四百岁。”^②他的感觉并非夸张,日本不是仅用二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欧近四百年的社会转型吗?

三

近代中日两国同样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,都急需富国强兵,抵御外侮。中国作出了“中体西用”的选择,最终陷入了半边缘化和衰败化深渊;而日本作出了“和魂洋才”的选择,成功地抵制了边缘化趋势并发展为独立的工业国。之所以有如此迥异的选择和结果,“既取决于外来挑战的性质、特征和强度,更取决于被挑战者主体本身的内在结构的牢固性、发展水平和应付外来挑战的手段和能力。”^③外来侵略的强度之异,自不待言。日本仅处在西方向东方进行殖民化推进的最远部位。殖民者侵略的重点放在物产丰盈而又处于沉睡中的“天朝上国”。就内部结构牢固性而言,日本传统的幕藩体制和将军—幕府二元结构,在外来挑战下易被摧毁,继而以天皇为新的权威而进行社会整合,形成近代民族国家。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独特的政治文化相结合,加强了中国传统历史结构的牢固性;而且华夏文明长期是向外辐射的,这就导致了当时中国对外来挑战的反应相对迟钝和麻木。总之,外来侵略的强度大

小,内在结构牢固程度上的差异,是影响中日两国面临挑战而作出不同决策的重要原因。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,“中体西用”与“和魂洋才”更主要地说明了两国文化价值取向和历史传统结构的差异。

中华民族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“天下国家”和“夷夏之防”的儒家理论的核心价值观,也即以中国中心观来认识世界,并构筑了自足发展的大陆帝国体系,形成了华夷—册封体制。在处理对外关系上,只有或战或抚等较为单一的方式。所以在西学输入时,有人就用传统思维引经据典地论证“中学原来是西学的师祖”与“西人由外归中”,将西学改装成不中不西的东西。所以对西学的吸取,都是在排外、保守的心态下被迫进行的。这也就难怪会采取“中体西用”的方式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了。

而日本却没有强烈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,没有册封体制观念。随着“兰学”的发展(“兰学”后期发展成“洋学”),日本已能将自身视为一国。更重要的是日本历史上有着大规模自觉地接受外来文化的传统,有着“和魂汉才”的经历,形成了多元的外向型文化,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为敏感。所以在面临西方挑战时,很快就认识到“宇宙形势之变化,学习有用的技能,或者去外国留学进行实地学习,此乃最重要之事。”^④于是由明治政府把“寻求知识于世界”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。这样外来威胁的刺激并没有抵制日本的近代化,也没有影响到日本自主性的选择,相反却提供了追赶西方的契机。

注释:

①魏源:《海国图志》卷一。

②冯桂芬:《采西学议》,《校邠庐抗议》卷下。

③《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》,《洋务运动》卷六,第206页。

④沈寿康:《匡时策》,《万国公报》第75卷。

⑤孙家鼐:《议复开京师大学堂折》,《戊戌变法》资料丛刊(二),第426页。

⑥《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》,岩波书店1974年版,第55页。

⑦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3年第5期第12页。

⑧王本武主编《严复集》第3册,第558页。

⑨转引自《日本问题研究》1994年第2期,第44页。

⑩罗荣渠: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版,第105页。

⑪高增杰:《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——也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》,中国和平出版社1984年版,第21页。

⑫罗荣渠:《现代化新论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第245、269页。

作者:四川大学历史系98级硕士研究生

责任编辑:屈小强